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三

古礼足征

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高崇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三

古礼足征

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高崇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 高崇文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5325-7903-7

I. ①古… II. ①高… III. ①礼仪—制度—考古学—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5642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高崇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颀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2.75 字数 697,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03-7

K · 2131 定价：1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赵化成	赵 辉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常务）		高崇文
郭之虞	程郁缀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 No.33

Ancient etiquettes still glitter: Archaeological insight into rites culture

Gao Chongwen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序 言

李伯谦

中国有史以来即是一个重视礼仪的国度,孔老夫子在谈及三代礼时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认为至少从夏代开始就有礼了。从有礼到形成完备的礼制,是社会的一种发展。春秋时期,《周礼》、《仪礼》、《礼记》所谓“三礼”的形成,标志着周代已是成熟的典型的礼制社会,学术界将古代中国称为礼制国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正是古代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屡屡发生,但其文化系统却从未中断,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制也在不断发展。正缘于此,至少从战国秦汉以降,对礼制研究便不绝于书,形成了所谓的“礼学”。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对礼的研究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跳不出文献的圈圈。上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以后,学界对考古调查发掘的遗迹、遗物进行研究,开辟了礼制研究的新天地,取得了许多新收获。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崇文教授《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便是从考古学角度开展礼制研究取得的一项最新成果。

该书分为五部分,第壹部分是礼制文明篇,第贰部分是都城礼制篇,第叁部分是丧葬礼制篇,第肆部分是青铜礼器篇,第伍部分是江汉地区古文化与楚文化研究篇,全书共收论文32篇,约70多万字,是高教授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研究40年间,对考古礼制文化和楚文化潜心研究的结晶。其中有些文章我是读过的,但这次通读全书却使我形成了全新的认识,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

一、通过长时段研究,全面系统梳理了礼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发挥的作用,如果你认真学习过第壹部分中的《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一定会有和我相同的认识。关于礼的起源,在这篇大作中,他在列举出诸位学者的观点后,正确地指出,“以上诸观点都是从某一方面或某一形式来谈礼的起源,只是观其形,而没有探其实。……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用礼来治理国家,形成一种独特的礼制性社会,是因为这种礼具有一定的约束性、权威性的特质,三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礼的特质制定了礼仪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源于祭祀,但“如果没有三代统治者将祭祀中逐渐形成的神权用在对国家的治理上,也不会形成三代独特的礼制性社会。正是三代的统治者利用祭祀中出现的的神权和祖权的权威性来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了神权、祖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国家体制,才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独特的礼制性社会”。我认

为,抓住了礼的约束性和权威性特点,也就抓住了作为古代中国礼制性社会特点的特质。

二、以考古发现为中心,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系统分析新石器时代城址、夏商周都城遗址和历史时期从秦汉至明清的都城遗址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从防御性的城堡发展为政治性的都城,进而演变为兼具礼制意义的都城的过程,揭示出以维护最高统治者权威和治理国家为宗旨、贯彻于从设计到施工全过程的礼制观念的决定性作用。这在第壹部分和第贰部分中的《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东周列国都城的礼制文化》和《古代北京城规划中的礼制文化》三篇文章中均有充分的阐述。建于今北京的辽南京、金中都和元大都,分别是原居北方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但其建筑均遵从了中原地区从周代延续下来的都城礼制,基本上维持了宫城、皇城、郭城三重城垣和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足见礼制文化的强大影响。

三、在系统分析商周秦汉丧葬礼仪制度发展演变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讨论了殉葬与祭祀、装敛礼俗及仪节、从“墓而不坟”到陵丘高筑、从庙祭到墓祭、棺槨制度、器物随葬及车马随葬制度等,对文献中一些艰涩难懂的有关丧葬礼仪的记述,依据考古学上的发现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时结合文献提供的线索,通过一环紧扣一环的分析、考证,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有创见地复原了古代丧葬礼仪中早已失而不传的内容。这在收入第叁部分的《殷周时期殉葬与祭祖仪式的变迁》、《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再论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等文中,均有精彩的论述。

四、以严格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对两周时期青铜壶、东周时期晋和楚国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排比,构建起了严密的两周时期青铜壶的分期与发展谱系,并探讨了晋系青铜器形制发展演变所反映的墓葬分期及楚式鼎演变规律,为青铜器分期与谱系研究提供了范例。

五、在分别梳理考古材料和出土文字、文献材料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比较与综合研究,揭示了楚文化从早到晚由陕鄂交界—丹江流域—沮、漳河流域而向江汉平原发展的轨迹,以及《清华简·楚居》所记楚人、楚都从早到晚由北而南转而向东迁徙路线之间的耦合关系,澄清了楚文化起源发展与楚都屡迁地望讨论中各执一词的混沌局面,提出了论证逻辑清晰、证据充分、有说服力的论断。

总括而言,这部从考古学出发所作的礼制文化研究论著,突破了以往单纯从文献到文献的框框,扩大了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渠道,论述全面系统,逻辑清晰严密,观点明确,论证有力,是该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一部佳作。

高崇文先生之所以能在礼制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第一要归功于他的勤奋。他毕业留校时,考古教研室给他定的方向是战国秦汉考古,几十年来,他不仅带着问题读遍了先秦两汉典籍,专研了三礼和前辈学者有关礼制研究、楚文化研究的专著与论文,还连续不断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从考古实践中积累资料、获取灵感。第二要归功于他的好学。从一毕业他就在俞伟超先生指导下,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学习理论,学习研究方法。他的《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既是俞先生给出的题目,也是在俞先

生亲自指导下通过多年努力写成的第一篇研究论文,读过此文,才知其用力之巨和功力之深。为了研究楚文化,他随俞先生不畏艰苦不断参加沮漳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发掘纪南城,发掘季家湖古城,参加各种研讨会,不断从多渠道汲取营养,了解、掌握学术动态和学术方向,从不自满。在 2013 年召开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上,他被推举为新一届理事长,读一读他在闭幕会上所作的《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报告,便知道这完全是出于学术追求的众望所归的选择。

从他 1972 年进入北大求学做学生到留校当老师,我和他已相处了 43 个年头,我对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感到意外,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他这部凝结着几十年奋斗心血的著作出版之际,我写了上面一些话,作为发自内心的对他的祝贺。

前言

本文集主要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礼制文化的。由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我试图从考古学遗存来探讨礼制文明的起源及形成过程,探讨礼制文明在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文化的统一中所发挥的作用,揭示古代礼制文化诸多不见记载、具体而微的面貌,以期解决一些只凭文献而不能解决的学术问题。

考古学在中国的出现比较晚,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礼制也比较迟。20世纪30年代杨树达著有《汉代婚丧礼俗考》,主要是从文献上进行考证和梳理,其中也用了一些传世文物资料。真正从考古学上进行礼制研究的是在50年代许多考古发现之后。1956年陈公柔先生发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利用当时在湖南长沙发现的东周西汉墓葬的材料,对《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进行了研究。后来沈文倬先生又发表了《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虽然有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但毕竟是真正从考古学研究礼制的开始。70年代,俞伟超先生、高明先生发表《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利用两周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鼎,对“三礼”记载的用鼎制度及由西周至战国用鼎制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墓葬中鼎制的变化规律探讨了当时社会结构、社会等级的变化,将研究考古学物质文化上升到研究社会关系的高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启发了大家利用考古资料研究礼制的思考。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后,引发了学术界对古代的丧葬礼制的研究,如对棺槨制度、绞衾制度、铭旌制度等的研究。90年代,李如森先生著《汉代丧葬礼俗》一书,囊括大量考古材料,博采众说,将考古材料与文献直接印证,是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汉代丧葬礼俗的杰作。20世纪后期开始,一些以文献为主研究礼制的著作也注意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记载,如陈戍国著《先秦礼制研究》,就比较多地引用了考古资料,尤其是早期的礼,基本上是用考古材料进行梳理的。另外,随着古代城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一些祭祀遗址、礼制性建筑遗址的不断发现,对于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古代的祭祀制度、宗庙宗法制度、都市礼制文明等也在不断深入发展。姜波著《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利用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唐长安城等考古发现,深入研究了汉唐时期都市礼制文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郑良树著有《仪礼宫室考》、《仪礼墓葬考》,曾永义著《仪礼车马考》、《仪礼乐器考》,利用考古资料解释《仪礼》,都有独到见解。90年代,日本京都大学小南一郎先生专门成立了研究“三礼”的课题组,已出版了多部《中国古代礼制研究》论文集,其中有许多论文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礼制的。

总之,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的礼制之学还在起步中,但是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这些考古遗存是古代礼制在考古中的直接反映,是礼制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象表现形式,我将其命为“考古学礼制文化”。通过考古学礼制文化的研究,我们可

以解决只凭文献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可以更为深入地探讨中国古代独特的礼制社会、礼制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对考古学礼制文化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俞伟超先生的指导。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俞先生是最为重要的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大学毕业留校后,我跟俞先生学习和研究战国秦汉考古。最初,俞先生给我制定的研究计划,是让我研究两周时期的青铜器,从类型学角度研究各区域青铜器的发展谱系,并让我先从研究铜壶入手。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两周时期铜壶资料全部绘图建立卡片,并于1979年写出了初稿。俞先生看后说,我的写法不对,因我先分了几个区,再分区研究各区的铜壶发展脉络与特点。俞先生认为,应当先将铜壶分型分式,首先从形态上梳理发展脉络,再根据各型各式来分析各区域铜壶的异同及特点。他让我将稿子先放一放,将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理解透了再修改。俞先生就让我看苏秉琦先生有关类型学方面的文章,并特别推荐苏秉琦先生有关宝鸡斗鸡台出土瓦鬲研究的文章和《洛阳中州路》报告。此时,俞先生正在编苏秉琦先生的论文集,他为论文集专门写了一篇《探索与追求》的文章,回顾了苏秉琦先生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贡献,总结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归纳了在世界考古学发展中“中国考古学派”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第一次梳理、总结和提高。初稿写成后,俞先生把我叫到他家让我看这篇文章,并且说他是流着热泪写成的。在我认真拜读文章的同时,俞先生擦着眼泪,激动地叙说苏秉琦先生对创建中国考古学科的贡献,我也特别感动。

1979年下半年,我和俞先生带学生到湖北当阳季家湖发掘和整理赵家湖楚墓,在俞先生指导下,我们将赵家湖楚墓按规格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丁类是无随葬品的空墓),每一类又根据不同的组合分为若干小类,每一小类又按器物形制进行分组。我在编写这批墓的报告时,就是按照俞先生的分类别、分型式的方法进行分期的,最后分析了各类别的变化规律及所反映的社会等级变化等。俞先生在《当阳赵家湖楚墓》序言中指出,这种先分类再分期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关系变化的新基础,从而可以把形态学的研究从仅仅解决年代分期问题的程度上升到研究社会关系的高度。这是从赵家湖楚墓资料整理工作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有关类型学理论的新认识”。在整理赵家湖楚墓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和加深了对考古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并写了一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俞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才是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之后,我对铜壶稿子的修改心里就有了底,1984年,我按类型学的方法对铜壶稿子进行了大修改,题目《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是俞先生给敲定的,并收入俞先生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前部内容为俞先生关于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后部则是我们几位学生的论文,是对考古类型学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对考古类型学理论的学习、理解和实践,均是在俞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在研究铜壶形态学问题时,受俞先生、高明先生写的《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一文启发,我对铜壶的使用礼制也产生了兴趣,所以在初稿的末尾谈了这个问题。俞先生看后,认为

深度不够,建议我去掉这一部分,并说:“谈礼制就要先仔细阅读‘三礼’,这是重要的文献基础。”俞先生把他收藏的胡培翬著《仪礼正义》拿给我,让我先认真仔细地读这部书,并说,读《仪礼》不读“郑注”不得其解,若不读“胡注”不得确解,可见俞先生推荐的这部书的重要性。后来又推荐我看张惠言的《仪礼图》和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仪礼》讲各种礼仪活动时,都要讲时间、地点、位置,讲一些礼器、物件放置的位置以及人们行礼时走动的路线和动作等。为了更明确这些活动,宋代杨復撰《仪礼图》十七卷,清代张惠言也著《仪礼图》六卷。他们按照《仪礼》各篇仪节的演进,每一重要仪节皆绘一图,每图皆详其宫室建制、礼器和人物的位置,以及行礼过程中人与物所处方位的变化等,使难懂的礼文通过图解,即可一目了然。《礼经释例》也是清代研究《仪礼》的一部名著,它把《仪礼》中的礼例分为246例,从中总结出一定的规律。读礼例对读《仪礼》有触类旁通之效,可以说是了解《仪礼》的一把钥匙。当时,高明先生请了对“三礼”很有研究的中华书局的王文锦先生来北大讲《仪礼》。我听王先生讲了两个学期的《仪礼》,参照《仪礼图》等书通读了《仪礼》,反复仔细阅读了《士丧礼》、《既夕礼》,了解了举行士丧礼的全过程,这奠定了我对考古学礼制文化进行研究的基础。后来在整理赵家湖楚墓时,我发现“棺束”有不同的等级,且从春秋至战国也发生了变化,其使用制度明显与礼书上记载的不同,我便写了《浅谈楚墓中的棺束》,对楚墓中“棺束”的使用制度进行了较翔实的论述,这是我第一篇用考古资料研究礼制的文章。在我给学生讲秦汉考古时发现,多数西汉诸侯王墓中殉葬三辆实用真车马,过去的报道多称这三辆车为“王青盖车”、“安车”、“戎车”、“猎车”或“辒车”,这些只是车的名称,关键是为什么都用三辆车殉葬,这中间肯定有一定制度。我就请教了俞先生。俞先生说,还是要从丧葬制度上来考虑,这使我马上想到了《仪礼》所记载的丧葬用车制度。《仪礼》记载,在先秦的丧葬礼制中,要配备乘、道、槨三辆车载死者魂衣送葬,郑玄明确解释此三车即相当于汉代的魂车。这样,我就写了《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一文。俞先生看后说,写得很好,商周秦汉时期的一些考古现象,有许多可以用礼制来解释,因这一时期的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本来就是一个礼制性的社会,必然要反映到考古上来。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后来又写了《楚器使用礼制考》、《楚“镇墓兽”为“祖重”解》等论文,重点研究了楚国的丧葬礼制。此后又对商周至秦汉时期的丧葬礼制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商周礼制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殷周时期殉葬与祭祖仪式的变迁》、《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试论周代棺槨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释“便椁”、“便房”与“便殿”》、《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秦汉帝陵寝制度探讨》等论文。这些文章的撰写,都得益于我对“三礼”等文献的研读。回想起来,特别感激俞先生帮助我打下的文献基础。

这部论集是我对考古学礼制文化研究的主要收获,共分四部分内容:

一、以考古新发现来研究中国古代礼与礼制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三代之所以用礼来治理国家,是因为礼具有一定的约束性、权威性,三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对天地诸神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这种权威性的特质制定了礼仪制度,形成了神权、祖权与政权相结合

的社会组织形态,用以维护统治秩序。第一部分利用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祭祀遗存,探讨由原始崇拜到祭祀权力的集中和神权、祖权的产生,再到三代时期神权、祖权与政权相结合的礼制制度,研究三代礼制形成的全过程,同时阐明夏商周三代在世界古代社会发展史中之所以能形成独特礼制性社会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它是以一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既体现为物象的行政规划形式,又体现了政治和意识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承载复杂的国家机器,处理人与人、人与神、国与国等诸关系,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显著特色,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第二部分通过考古材料,探讨聚落的形成、聚落的社会形态,都市的形成、都市的社会形态,由聚落到都市发展的社会转化等,利用考古资料探讨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过程。

三、先秦两汉丧葬礼制研究。“三礼”记载的古代丧葬礼制比较多,《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专门记载了周代的丧葬礼制,但有许多内容还读不懂,有些虽然能读懂,但这些礼仪制度是怎样进行的并不清楚。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是古代丧葬礼仪制度最直接的反应。有了这些考古资料,可以对“三礼”记载的一些礼仪制度进行印证和深入研究。第三部分利用墓葬资料,结合“三礼”记载,研究先秦至两汉的丧葬礼制及其演变,探讨商周殉葬与祭祖仪式的变迁、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秦代陵寝制度的产生、汉代陵寝制度的形成等。

四、礼器类型学及使用制度研究。周代礼制的核心在于定等级,明贵贱,“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等级、名位又通过使用不同数量、不同规格的青铜礼器来体现,青铜礼器是周代礼制最为重要的物化表现形式。第四部分利用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探讨了两周时期各区域青铜礼器形态的变化及礼器使用制度。

最后还附加了一部分楚文化研究的内容。楚文化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我多年来关注楚文化的研究,故将这方面的研究收获收入本论集。

考古学礼制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随着众多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对其研究肯定会更加深入。现仅就我现阶段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以飨读者,也希望研究者斧正。

这部文集的出版,要特别感谢李伯谦老师。几年前李老师多次让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由于庶事缠身,终日繁忙,这一拖就是好多年过去了,现在才完成。在整理文稿之时,也每每想起李老师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李老师曾四次带领我们班进行野外教学实习,无数次参加我们班的各种活动,同我们班结下了深厚感情,一直到现在感情尤甚。特别是我留校工作以来,更加直接地得到李老师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每想至此,都涌现出对李老师的由衷感激之情。

本文集部分文字的录入及插图制作,得到了张天宇、蔡宁两位研究生的帮助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缪丹女士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诸多辛劳,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目 录

序言	李伯谦(i)
前言	(i)

壹 礼制文明篇

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考古学观察	(3)
江汉地区青铜礼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48)
商周礼制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反映	(60)

贰 都城礼制篇

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	(71)
东周列国都城的礼制文化	(82)
古代北京城规划中的礼制文化	(114)

叁 丧葬礼制篇

殷周时期殉葬与祭祖仪式的变迁	(127)
试论先秦两汉丧葬礼俗的演变	(141)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	(164)
试论周代棺槨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	(171)
浅谈楚墓中的棺束	(181)
楚“镇墓兽”为“祖重”解	(191)
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	(201)
再论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	(209)
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	(217)

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再研究——以北京大葆台汉墓为中心	(224)
释“便亭”、“便房”与“便殿”	(233)
论西汉时期的祭奠之礼	(242)
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	(255)
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大墓的发掘与研究	(281)

肆 青铜礼器篇

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	(307)
试论晋南地区东周铜器墓的分期与年代	(365)
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	(385)
楚器使用礼制考	(407)

伍 江汉地区古文化与楚文化研究篇

长江中游古代文明的发展与三苗传说	(417)
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起源	(427)
楚文化渊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谨以此文纪念楚文化研究巨擘俞伟超先生	(434)
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闭幕式 上的讲话	(442)
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	(447)
从考古发现谈战国时期秦楚关系	(455)
春秋楚墓特征及其形成诸因素初探	(463)
楚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472)

| 壹 |

礼制文明篇

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考古学观察

夏商周三代是一种礼制性的社会,三代的礼制既是生活习俗,又是思想信仰,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制度,三代的统治者正是凭借礼制来保证等级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①。礼成了治国安民之根本,它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礼仪制度与礼制文明之模式。在世界古代史中,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性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中华古代文明有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独特性。因此,研究三代的文明史,不能不涉及当时的礼制文明。为什么夏商周三代会形成礼制性社会?这种独特的礼制文明又是怎样形成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认真探讨的问题。以往研究者多根据文献来研究礼制文明的起源,虽各有所据,自成一说,但对于夏礼、殷礼或更早的礼来讲,毕竟如孔子所言“文献不足故也”^②。由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从考古学遗存来探讨礼制文明的起源及形成过程,也应当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一、夏商周三代礼制文明的特质

近现代学者对于古代礼与礼制文明的起源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礼起源于祭祀说。郭沫若认为,“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③(2)礼起源于风俗说。认为俗先于礼,礼本于俗。刘师培认为,“古代礼制悉赅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然在考察冠、婚、丧、祭等礼之后则称,“观此四端,足证上古之时礼源于俗”。^④(3)礼起源于人情说。李安宅提出:“礼的起源,自于人情。”^⑤何联奎也认为:“礼的来源,是出于人类一种自然的表示,如叩头跪拜,打躬作揖,对神表示崇拜及对人表示敬意。”^⑥(4)礼起源于礼仪说。杨宽认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社会中,人们已惯于把重要行为加上特殊的礼仪。原始人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构成种种仪式,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论语·八佾》。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96页。

④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礼俗原始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678—683页。

⑤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第二章,载《国学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31年。

⑥ 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导言》,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